

【新闻与传播学研究】

走进众声喧哗时代：中国互联网 20 年

胡泳

中国互联网 20 年了。

20 年的高速发展，互联网给我们的社会构成留下明显的印迹。最突出的，是它造就了所谓“数字化土著”（digital natives）和“数字化移民”（digital immigrants）的分别。前者是与科技一起诞生也一起长大的，早就视科技为生活环境的环节之一，与周遭的其他事物融为一体。对许多孩子而言，用电脑就好像呼吸一样自然。而后者对科技却必须经历截然不同且较为艰难的学习过程，如同现实世界中新到一地的人，必须想出各种办法来适应崭新的数字化环境。

网络公共领域在中国的作用

如何看待网络公共领域在中国的作用呢？首先，分权、匿名和灵活的互联网促进了信息传播的民主化。其次，互联网创造了对政治和社会问题展开讨论的公共领域。第三，互联网加强了民众之间的联系与集体行动。

网民成长的十个面向

在自演进的互联网发展当中，网民群体也学会了自组织、自成长。这样的成长，呈现出以下十个面向：

1.网络围观：见证的力量。近年来，中国网民多次发起围观行动。这样的围观是有力量的，其力量源自两个方面：首先，在互联网上传递真相堪称一种见证行动，它意味着把信息移动到最能产生影响的地方。其次，公民得以借此达成共识，或是发起某种公共行动。融化现实的“冰川”要靠整体热量。

2.网络社群：“简单得可笑的群体构建”。今天，跨越地域与阶层的分享与合作的工具终于交到了个体公民的手中。兴趣相同者开始利用互联网从事志同道合的事业。由此，一种新生事物开始在中国出现——网络社群。

3.公民新闻：人人是记者。公民新闻是传播成本降低后的产物，在帮助民间发声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一种无所不在的独立监督力量。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和手机使得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以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周围的社会环境，从而可能为公共讨论注入一种想法、一个批评或是一种关注。

4.网络维权：从上访到上网。据《检察日报》2010 年 11 月报道，一项网上调查显示，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时，有 75.5%的人会选择网络曝光。

5.网络恶搞：中国的象征政治。网络恶搞是中国独特的象征政治，网民使用恶搞、“山寨”等完成“想象的报复”。通过这种象征政治，无权势者被赋权，有权势者被去势。恶搞和山寨以戏谑、戏仿的姿态，一面消解至高无上的权力，一面对主流价值极尽嘲讽之能事。恶搞的盛行也显示了网民的无力，狂欢背后也不乏恐惧和虚无主义。批判的武器毕竟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解构的快意也永远无法承载建构的艰难。

6.网络动员：虚拟的集会自由。互联网加强了民众之间的联系与集体行动。近年爆发的多种集体抗议行动，初步显示了互联网作为一种组织民众手段的作用。数字革命最为直接、有力的警示效应是在对大众进行快速、大规模动员方面所具有的便利性。它只带有很少的等级制与核心指挥，堪称一种“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在各种事件与社会运动中，这样的力量一再显现。

7.网络监督：问责性技术。网络技术被用来拓宽公共领域，加强社会监督，创造一个更加多元以及自治的新闻、评论以及信息的空间。新的技术也是加大透明度和问责性、记录以及遏制官员滥权、侵犯人权和民主程序的强有力的工具，堪称“问责性技术”。视频分享、数码相机、论坛、博客和微博的结合，特别是中国网民对于人肉搜索的应用，为挑战和揭露滥用权力创造了新的可能性。它们也可以帮助网民更加方便快捷地了解政府的开支、立法信息和决策过程。

8.网络问政：是否只能问问而已。网络问政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胡锦涛总书记 2008 年 6 月 20 日到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对话，并特别强调：“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在网络问政火热一阵之后，我们需要的是常态化、固定化和制度化的信息沟通、公民表达与社会监督。充分利用好网络民主这个平台，对于有效保障和实现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对于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9.网络扒粪：迎头痛击社会诚信的缺失。越来越多的名人“被扒粪”，中国社会诚信的缺失遭到互联网的迎头痛击。

10.网民权利：在宽容和对话中共建中国互联网。在中国互联网发展中，政府与网民同样面临困境。网民的困境在于，一方面，网民正当权益未得到清晰界定，权利得不到应有保障。另一方面，政府单方制订规则，加剧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称。

政府的困境则在于，想有效治理，但由于全能式的管理，反而管出越来越多的网络“暴民”。

中国互联网要想进一步发展，需要政府与网民共谋利益，共同制订规则。政府方面需要明确，网民既是监管对象，更是服务对象，主要是服务对象。

摘自《新闻战线》2014 年 6 期

大屋顶思维：中国新闻教育思想的起源路径

李军林阳海洪

“大屋顶”是梁思成提出的建筑设计理念，它的核心是包容性，要求建筑设计兼顾现代风格与民族特色，力图打通传统与现代的两极，寻求两者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形成中国建筑设计的新理念。这种大屋顶思维，对于我们探讨中国现代新闻教育思想的起源路径很有启发。1918 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由徐宝璜和邵飘萍担任主讲。这是中国第一个系统讲授传媒专业课程并研究新闻学的团体，标志着中国现代新闻教育由此发端，他们的思想可以被概括为“大屋顶”教育观。它一方面坚持普遍原则，认为源于西方的现代传媒及其新闻教育制度具有普世意义，教育之目的是养成现代新闻观念，培养专门传播之才；另一方面坚持分化原则，将传统道德化为记者的个人修养与职业伦理，赋予新闻记者士人之魂。这种兼顾现代与传统“大屋顶”教育观，对于当代中国新闻教育仍有借鉴意义。

摘自：《当代传播》（乌鲁木齐）2014 年 3 期

从网络媒体到网络社会：中国互联网 20 年的渐进与扩张

彭兰

中国互联网发展的 20 年，也是中国网络媒体从弱到强、从边缘到主流的 20 年。这并非只是一个媒体的壮大过程，它也是一个网络媒体向网络社会扩展的过程。经过 20 年渐进与扩张的中国网络媒体，正在一个全新的网络社会的版图上，开始新一轮的发展与竞争。新闻网站与传统媒体究竟去向何方，也必须在“网络社会”而不仅是“网络媒体”这样一个基础上进行新的思考与谋划。

摘自：《新闻记者》（沪）2014 年 4 期

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参与国家智库建设若干问题的探讨

丁柏铨

新闻学与传播学应该如何在国家智库建设过程中发挥作用？

第一，以我为主主动地发挥作用。由处于全国第一方阵的高校新闻院系或相关研究基地牵头，通过所设置的社会舆论及舆情研究等类议题，将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伦理学等学科调动起来，将高等学校、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传媒业界等方面的力量集聚起来，展开协同创新研究，发挥其在国家智库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通过研究重大命题发挥作用。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中的重大命题，往往也就是国家智库必须直面的重要问题，涉及如下关键词：深化改革，社会转型，核心价值观，自媒体，舆论变局，传播规律，民心向背。新闻学与传播学要紧扣重大命题，在研究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三，在证明自己实力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新闻学是否有“学”，这是一个常常被问及的问题。因此，要用自己的实力，证明新闻学有学、有用。有学、有用，不仅体现于学科所必须具备的概念、范畴、理论体系及逻辑框架，而且基于对政府机构的监督作用、对媒体的指导作用、对管理部门的智囊作用、对民众的引导作用。

第四，在发出准确预警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新闻传媒要当好社会的瞭望哨，为人们发出准确的预警。尤其重要的是：要瞭望社会舆情、准确分析研判舆情。发出准确的预警。新闻学与传播学在国家智库建设中发挥作用，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其一，评估已有政策的得失。不管我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是始终必须坚持的。在这一点上，不能有丝毫动摇。但智库建设者应当清醒地意识到：有些规制在过去时代（国门紧闭的时代、计划经济时代、仅有传统媒体的时代）是很有道理、很有必要的；但在人人掌中都握有处于移动状态的自媒体语境中，应当允许和鼓励地方主流媒体在第一时间勇敢发声，发负责任的权威之声，回应公众普遍关切的问题，履行主流媒体的应尽职责。

其二，修补现有政策的不足。国家智库的建设者，应担当起对政策和决策该肯定则肯定、该批评则批评的重任，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智库的使用者、拥有者，应该听得进对现有政策所存在的不足、对执行政策过程中的失误的批评，要特别注意发现需纠偏和修补的地方。智库建设者如果只说恭维话，那么智库的作用就不会大。

其三，建言出台新的合乎社会发展需要的政策。我们正处于改革深化和除旧布新的时代，新生事物大量涌现。就社会舆论格局而言，其变化异常明显。需要出台一些新的政策，以适应新的社会舆论格局，适应社会发展的新的趋势。这是国家智库建设中必须有所考虑的问题。

其四，注重为顶层设计出谋划策。

既然是国家智库，就应该体现与国家智库的称谓相匹配的职能和高度，避免缺乏高度和过于琐碎。就新闻学与传播学而言，参加国家智库建设，就应当关注新闻传播、舆论引导、舆情监测和研判、新闻传播管理等方面的顶层设计，为此做出自己的应有贡献。

摘自：《新闻爱好者》（郑州）2014 年 2 期

互联网与中层民主的兴起：互联网与政治发展的中国实践

孙立明

一、网络民主的兴起：从概念到实践

中国网络民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99 年到 2003 年，这期间是网络民主的酝酿期。网络中关于政治的话题相对较少，网络的主要功能是观看新闻、收集信息和游戏娱乐。第二阶段：从 2003 年到 2007 年，网络民主开始兴起，并进入网络空间之外的大众视野。这也引起政府部门一定程度的关注。“孙志刚案”和“非典”这两大标志性事件，将底层权利与政府部门和政府管理联系起来，将公众的知情权与政府的信息公开联系起来，也将传统媒体与互联网新媒体联系起来。从这以后，个体意见表达、网络舆论、政府信息公开和政府回应开始进入公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中国的政治生态也为之一变。第三阶段：从 2008 年开始到现在，网络民主进入扩散和深化阶段。2008 年，网络问政的出现使网络民主又向前跨越了一大步。这一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有两个：一个是 2008 年 6 月 20 日胡锦涛同志在人民网与网民进行交流。另一个是 2008 年 4 月 17 日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第一次与网友见面时提出，要“构建充满活力、和谐有序、建设性的网络民主平台”，从“民意渠道”到“民主平台”，网络民主获得了民间和官方的一致认可，因此，许多人把 2008 年称为“网络问政元年”。

二、中国的网络民主——网络中层民主

我们把中国的网络民主称为一种“中层民主”，或者直接叫做“网络中层民主”。首先，它是基于互联网发展兴起的一种民主形式和民主实践；其次，就网络民主在民主政治发展整体结构中所处的中间地位，网络民主参与主体的社会中间性和网络民主运作方式的媒介化特征这三者而言，它是一种具有多重“中层”和“中介”属性的民主形式；再次，借助互联网的扩散和影响，网络民主一方面充当了沟通上层政治与底层民主桥梁的角色；另一方面，向上对高层政治、向下对基础民主产生影响。以往民主政治发展呈现的局部性、断裂性特点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一个以网络民主串联起来的整体性民主实践框架正在浮现。

三、结语

互联网在中国的民主功能一直是中外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是民主的催化剂，随着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广泛普及，其政治影响也难以控制，类似西方方式的民主或不可避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互联网在中国的应用，必然会受到政治文化传统与现实条件的多重制约，认为互联网将对政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我们认为，互联网在民主政治进程中正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正面影响远大于其负面作用。与那种认为中国中产阶层“消费前卫，政治后卫”的观点不同，网络中层民主的实践表明，以社会中间层和青年为主体的网络政治参与者通过公共舆论和网络问政等方式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开辟了一条新路。

中国的网络民主是一种中层民主。在结构上，网络中层民主在高层政治与基础民主之间通过公共领域的建构形成了公众舆论和公共参与空间，这在中国政治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从主体特征看，网络中层民主主要反映了城市社会中间层的民主诉求和政治意愿；从政治过程的机制看，它依赖了互联网和媒体所构建的信息传播渠道和官民互动机制；从民主形式看，它具有参与民主、协商民主与大众民主的某些特征，对法治、公平与平等的追求构成了网络中层民主的主基调。

当然，作为一种最新的民主实践，网络中层民主还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其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也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尽管如此，在当代信息技术革命、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网络中层民主确实给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和想象空间，其今后的发展状况如何将会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形成越来越大的影响。

摘编自：《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 年 1 期

互联网与集体记忆构建

胡百精

集体记忆是族群认同的基本依据，是共同体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互联网改造了人类的时空观和现代社会的权力关系，为集体记忆的书写和阐释带来了挑战：祛魅、断裂、窄化、公共舆论主导、常人社会消费和部落化等。这些挑战加剧了现代认同与合法性危机，同时也潜隐着再造社会团结与共同体生活的可能性。应当促进多元协商、构建公共领域和重彰价值理性，以形塑互联网时代的集体记忆、族群认同与合法性。

摘自：《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 年 3 期

【哲学研究】

平等和差异：人生价值的辩证法

靳安广

每一个人都渴望拥有出彩的人生，即创造和实现价值。如何才能拥有人生价值，也许需要每一个人去寻求去思考。只有在不断地追问中才能逐渐澄明。这或许根源于人生价值的内在矛盾性：既有平等性，又有差异性。每一个人作为人的体现和独一无二，不以各种外在的条件而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有同等的做人的权利，有同等的人格尊严，因此其存在的价值是平等的。另一方面，现实的人所具有的具体条件，使其与其他人存在种种差异，每一个人因其不同的作为而书写出不同的人生，从而具有不同的价值。肯定人的价值的平等性，人与人之间才能有一个交流、理解、合作和共处的基础。承认人的价值差异性，我们将意识到人生的责任，努力创造和提升自身价值，珍重自己独特的人生并尊重和容纳他人的人生。

摘编自：《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 5 期

“哲学的终结”与实践的哲学人类学基础

邹诗鹏

本文试图将马克思实践哲学所蕴含的哲学终结论与海德格尔的哲学终结论进行一种比较性的探讨，意在深化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哲学人类学基础的领会。马克思实践观变革与海德格尔所谓“回复”都是在生存论意义上展开的，但是对实践的规定却完全不同，并由此规定了两者生存论的不同性质。马克思的实践观显然是在激进思想背景中强调主体“人”的实践及其历史超越，海德格尔所谓“实践”则是向存在本身的回复，且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双重拒斥。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及哲学的批评，也特别针对马克思的遗产，这就是将马克思所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再次问题化，马克思使哲学转变为实证科学，而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恰好表征着思想的再度贫乏或缺席。海德格尔的批评再次使我们回到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存在论或生存论基础。当然，这样的探讨在现代理论史上依然重要，因为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话语所抽掉的，也正是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哲学人类学基础。但是，无论海德格尔还是阿尔都塞，当他们否定或抽掉实践活动的哲学人类学基础时，实际上都无法把握到马克思在现代性意义上所揭示的实践。

摘编自：《学习与探索》2014 年 4 期

【管理学研究】

高校协同创新的管理机制优化路径

张刚刚郭国祥翁建明

一、协同创新对高校管理机制优化的要求

首先是优化高校管理的目标导向。其次是不断提升高校的自身管理水平。最后是获得被管理者的积极认同。从协同创新的角度出发，协同创新的各个群体、个人在工作目标、理念和管理体系方面都存在着先天和后天的差异，这种差异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管理根据某一事物特定的规律和现实条件，能动地推动着矛盾的解决，可以说管理体系的效率决定了矛盾解决的成效。

二、高校管理机制与协同创新的矛盾分析

（一）利益分配机制与协同群体间的需求矛盾

首先，从组织来看，由于组织性质的不同，对协同组织自身所要实现的目标利益诉求必然不一。高校、科研院所倾向的是科学技术的深度，政府所倾向的是社会效益，而社会组织特别是企业群体倾向的必然是经济收益或者能带来经济收益的潜在技术。其次，高校只是协同创新的参与或发起者，并不具有制定利益协调机制的权限。再者，参与群体和参与者个人对利益的诉求也不可能完全一致。这种利益诉求的群体性、层次性和不易协调性，是协同创新存在的最大瓶颈。

（二）领军人物的错位与协同创新的管理矛盾

目前，我国协同创新中心的领导，一般由高校、地方政府或科研机构的行政负责人担任。不可否认，由行政负责人担任协同创新中心领导在协调财力、人力、物力方面会对协同创新中心起到积极作用，但其在专业、管理等方面缺乏足够的理论基础。由于其日常事务工作较多，对协同创新中心缺乏必要的管控措施。同时，协同创新中心需要研发的目标是较高或较高领域的技术和理论成果，技术层面的领军人物都在各在单位和领域有着各自的独特见解和技能，也可以说是各自单位的“精英分子”，在这种情况下，缺乏权威性强、影响力大的领导者，很难把精英分子有效聚合起来，各司其职地开展具体研究工作，给协同创新造成了很多不确定性。

（三）不同群体参与者与协同创新的目标矛盾

从协同创新中心的组织形式来看，参与者来源于高校、科研院所、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从大的层面讲，不同国家的参与群体在文化、思想和行为方式上有着不同的先天素养和信仰。从小的层面讲，不同参与者代表着各自的群体，在协同创新的大目标下，其自身的小目标(包括单位目标、个体目标)也不尽相同，学术界追求科研成果，政府注重社会贡献，企业注重经济效益。但高校创办协同创新中心的大目标显然为以科研成果为重，如果大目标不能全面、有效地包容所有的小目标，会产生内耗现象，造成财力支持不够，实效性不强，社会效益不佳，对协同创新的效率则会产生负面影响，有时，这种影响甚至是破坏性的。

（四）高校行政分割与协同创新的管理矛盾

协同创新的成员来自于各个单位，因为不隶属于同一单位，其工作性质、管理标准、文化氛围不尽相同，本身就给成员单位和个人之间的配合形成了天然的隔阂。其次，由于具体参与者还要承担其单位的工作，主要服从原单位的管理，难以保证对协同创新具体工作的有效时间。更重要的是，由于参与者来自于各个单位，其工作关系、工资关系、人事关系隶属于不同单位，协同中心无法对其进行正激励和负激励，由于缺乏有效的督导措施，一些协同创新中心往往处于空有其表、其实难副的尴尬境地。

三、基于协同创新视角的高校管理机制的优化路径

从协同创新这一角度出发，优化高校管理体系，必须有效面对各个群体间存在差异，正确认识矛盾产生的本源和解决的途径，做好五项协同机制：即利益协同机制、精英培养协同机制、目标协同机制、奖惩协同机制、功能协同机制，使高校管理更好的顺应开放、合作、共赢的时代发展模式。

（一）强化利益协同机制

利益的共享和科学分配的利益协同机制是协同创新成功的基础。一要利益共创、共有。二要利益科学分配。三要利益透明分配。高校协同创新要推行“协议约定、透明分配、动态管理、尊重原创”的原则，充分针对学术成果、应用成果等各个层面，进行公开分配。一方面，可以持续获得协同创新组织内部成员的信任感和归属感，一方面，可以对协同创新自身产业良好的社会影响，推动协同创新良性发展。

（二）加强精英协同培养机制

协同创新取得成果，并在实践中收到良好的学术、社会和经济等综合效益，需要培育以下三方面的精英人才：一要培育权威性精英。二要培育学术精英。三要造就实践精英。

（三）建立目标创新协同机制

有共同的愿景、共同的奋斗目标，是协同创新取得成功的基础。一要明确参与群体间的共同目标。二要明确协同创新成果集。三要明确优选方案。四是创新初步成果实现。根据方案、规则，协调各个群体拿出初步创新成果。五是进行仿真论证。完善评价和监督体系，将初步成果置于仿真的环境中，模拟推理，总结、反馈初步成果的缺陷，并进行分类，有针对性提出改进措施。六是最终成果。经过管理、学术、应用各个层面的充分论证、共同研究，形成最终成果。

（四）加强协同创新奖惩机制

没有监督就意味着失控。协同创新本身就是高校内部的单位以及高校外部机构之间进行横向、纵向联合所进行的综合性学术研究工作，因此，给管理上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建立基于协同创新目标的协同奖惩机制是基础性管理工作。一要建立共同的奖励晋升机制。二要建立互补的惩处机制。三要建立协调的推进机制。

（五）深化创新职能协同机制

相对于高校自身而言，协同创新中心是一个临时性组织，各个参与群体或单位的职能都是临时的。因此，形成职能协同机制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一要发挥组织者的管理、引导职能。二要发挥学术带头人的攻坚、支持功能。三是要发挥应用者的参与、反馈功能。四要发挥相关组织的指导、服务功能。

摘编自：《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 3 期

【社会学研究】

发展社会学研究的困境

杨建华

发展社会学曾经辉煌，但由于“发展理论”研究中，发展的本体是什么，谁在发展，什么在发展，并不明确。同时，对中国发展社会学研究来说，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先于社会发展理论，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理论缺场，理论滞后于实践。因此，发展社会学研究目前出现了一系列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作为发展社会学认识论基石的理性本身的困境，现代化理论二元两分范式的困境，研究对象与方法的困境。发展社会学研究的困境在呼唤着发展社会学的深化，呼唤着构建更具本土解释力的发展社会学，为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指南，实现社会发展的理论自觉。

摘自：《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4 年 3 期

社会组织发展的深层困境及其对策研究

谭日辉

培育扶持社会组织日益成为新时期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但由于我国社会组织发展正处在从控制性管理向服务性管理的转型时期；支撑社会组织建设的制度平台尚不完善；部分社会组织的负面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大；以及培育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的文化氛围还处在转型期等制约着社会组织的发展。为培育扶持社会组织，政府应加强顶层设计，抓住制度建设这个根本，抓住典型地区社会组织建设这个关键，抓住公信力这个核心，抓住人才建设这个基础，最终促进社会组织步入全面发展和大幅提升时代。

摘自：《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 年 1 期

人类学与文化转型

——对分离技术的逃避与“在一起”哲学的回归

赵旭东

伴随着权力支配方式转变，文化形态亦在发生着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它意味着一种跟各文化相关联在一起的转型人类学的出现。这是以自我的文化体验为判准的一种文化内生的人类学，它的基础在于去深度考察那些为西方现代理性所切断联系的文化逐步恢复与重塑。一种文化的转变需要人们认识到人不再是一种功能论式的理性的再生产模式的造物，它还是一种能动的自我的生成机制，它为激情留有足够的空间，并使之与理性有了一种最为完美的结合：那就是告别单纯的反思，直面多样性的文化的表达，并在欣赏和培育文化情调中去拒绝一种无中生有的批评与嘲讽。文化是促推社会凝聚的黏合剂。文化的不转变，只能意味着文化自身的“化石化”。作为社会之灵的文化，其存在大多是隐而不显的，文化若不是以这样的方式存在，文化也便难于成为其自身。

摘自：《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 2 期

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学研究

皮尔波洛·多纳蒂

全球化进程的出现与社会学的理论危机如影相随。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全球社会”（globalsociety）已经将“社会性”转型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 19 世纪的古典社会学理论显得既不宜“新社会”的概念化，亦不宜（人类）社会的概念化。人类社会与非人类社会的根本区别已经不复存在。有鉴于此，是否可能建构一个“社会理论”？该理论的架构又将如何？本文认为，现有的“全球社会”理论重复了以往理论的错误，其原因在于，这些理论过于受当时特定社会所具有的历史特点的影响。然而，认为全球社会代表了现代性最后阶段的说法依然有待商榷，其误导之嫌在于，它将(全球化的)特定现象与社会构成的所有方面合为一体。这当然也不会妨碍我们讨论“全球社会学”(globalsociology)，将其作为适用于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学用语。

目前可以确认的有关全球化的社会学阐释主要有四种，它们的共同性远大于差异性：（1）全球化即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如沃勒斯坦所言）；（2）全球化即世界的相互依赖（参照法语国家所用的世界化 mondialisation 一词）；（3）全球化即心智（mind）的标准化，该词源自马克思在其《大纲》中阐述的“一般智力”概念，简言之，全球化即文化的趋同性；（4）全球化即向着单一“世界社会体系”迈进了一步（如卢曼在 1984 年所言）。然而，概

其所言，全球化被视为现代性实现的成果。即便具有这些认知，人们仍难以破除旧有的、限制质性认知飞跃的视界。而这种飞越恰恰是时下所需要的。

为了实现这一飞跃进而思考全球化及其转型的成因特质，社会学必须致力于建构一种新的概括性理论(例如“关系性”理论)，从而使我们得以将不同的社会形态区别开来。具体而言，这一理论应该能够明确地阐述“全球社会”在哪些方面有别于其他各种社会形态。

建立关系性社会学理论的呼唤源于这一框架，其目的在于避免简化论，并且还要克服后现代理论固有的困境与难点，特别是其禁锢性。关系理论的目的在于说明社会是由社会关系所组成的，人类兼有内在性和超越性。社会仍然是由人类所制造，但是，它越来越不完全由人类所组成了，而是包含了越来越多人类所制造的社会关系。这样的认知方法能够激活社会学建构及社会的人性维度，尽管当代社会生活中存在明显的人性缺失。

每一种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制造社会”，并以此方式与其他文明相区别。对于社会系统(例如家庭)进行概念化有着各种各样的方法，与之相类似的是，人们对于何为社会的认识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1)在古典社会学的框架中，社会中人的维度被视为类似于有机性。(2)在后现代社会学中，社会中人的维度具有隐喻性，是通过对于何为“自然”之否定来加以界定的。(3)在跨现代社会学(transmodernsociology)中，社会中人的维度具有关系性，它植根于关系之中，又自关系中生成：人之为人意味着存在于某种社会关系之中，存在于选择独处还是与他人共处的纠结之中。

伴随着社会复杂(全球化的)程度的提高，社会关系作为社会内部的人性要素，其重要性也愈发增强了。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关系对于个人的人性发展愈发重要——从他或者她最初的(前社会的)本我，走上成为能动者(anagent)的道路，然后变成团体的“我们”，最终成为个体的行为者(actor)。

作为自身检验的基础，适用于全球化进程的社会学理论要具有捕捉各种关系的形态静止/形态改变(morphostasis/morphogenesis)的能力，而且不仅仅是结构、文化和能动性(agency)的。多种关系的形态改变并非其个体要素发生改变的结果，而是依赖于社会关系自行分化的可能性，即是有其独特衍生机制的新生现象。

全球化并不是所有社会归属的“销蚀”，尽管现代性一贯强调的是成就。全球化不是一个循环往复的个体化过程。现代性功能分化已经到达其极限，许多社会现象似乎都表明，功能分化不再能继续担当解释社会分化的主要方式的角色。

全球化与“超越原则”(principleoftranscendancy)如影相随，也就是说，我们在某种关系的多种表达方式之间找到越多的相似性，这些词汇就愈发显得不同且各具特点。这恰恰是

多元化世界所暗示的，即一般性的关系性分化。假定每一种特质都由一种关系（不是否定）所构成，驾驭复杂性的新方法便成为可能。全球社会不必重复现代性的老路，去分解和掌控社会分化和社会整合。全球社会通过关系性内涵，而不是通过自由与控制的（功能的）辩证内涵进行运作。兴起中的网络社会源自多个“地域”社会形成的网络，这些社会不再依据领土原则所分界，而是基于那些规范它们的符号和交际代码。这种新型的社会可以被界定为“关系性的”，因为它使地域性社会与全球社会相互交织。在此情况下，关系性社会以某种形式的社会分化为特点，这种社会分化愈发不会被纯粹的（抽象的）现代性典型方式，或者说，被功能性分化观点所左右。社会中人的成分不再被旧时欧洲曾用的有机的这类词语所解释，也不会采用后现代隐喻来解释。而人类行动的关系性意义充分认可了那种将其转化为一种未知社会形态的力量。

摘自：《国外社会科学》2014 年 2 期

【政治学研究】

公共话语的演变与危机

任锋

对于公共性的讨论亟须立足于文明传统内在机理的观察和反思。中国传统中的公共意识和精神以天人秩序和三代典范为基线，并于近世见证了公共话语的兴起与公共理念的成型。共治宪制（公法、公论）与社会治理形成了这一过程的实践语境，以理学为代表的近世儒学扮演了关键角色。近世公共话语在现代经历了复杂的转型，同时也显露出内在危机，这也成为反思与推进公共性讨论的重要缘由。

摘自：《社会》2014 年 3 期

公民社会的“民情”与民主政治的质量

杨光斌李楠龙

中国思想界基本上把公民社会视为民主政治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这种流行的观念看上去似乎不错，因为没有社会自治也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政治。但是，本文所检视的公民社会理论和比较历史视野下的鲜活案例告诉我们，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国家治理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正向的线性关系，有时甚至是逆向关系，比如意大利南部、印度和大中东地区的作为公民组织的穆斯林兄弟会就是这样。认真研究后的理论发现是，公民社会的性质即“民情”，是连接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的中介机制；公民社会的民情决定着民主政治和国家治理之间的各种可能性关系。

摘自：《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 3 期

当代中国政治学创新与发展的内在逻辑

张贤明

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学科的政治学也需要创新与发展。当代中国政治学创新与发展的逻辑，就是要以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特点为基石，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历程与创新精神为前提，以凸显政治学学科的学理性和开放性

为重心，以注重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坚守与多元为抓手，以理论建构与现实关照并重为面向，从而以创新推动中国政治学繁荣与发展。

摘自：《社会科学家》2013 年 12 期

【文学研究】

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的精神现象学

胡友峰

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在其精神表征的现象学维度上呈现出了一种技术掌控而人文去势的特征。在技术掌控上表现为技术赋型、比特叙事和超文本兴起的，在人文去势上则表现为电子媒介对人文精神的消解与重构。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精神呈现的完美的态势应该是技术与人文一种兼收并蓄、和谐兼容的状态，人文把握着的文学方向，而技术则是在人文大方向的引导下，推进文学的载体的技术进步。这样既能做到文学在技术中发展，同时又能做到不打破文学本身发展的特性，突出文学的地位，达到技术与人文博弈的最和谐状态。

摘自：《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14 年 2 期

文学人类学的方法论演化及其限度

王大桥

中国语境中的文学人类学研究于 20 世纪前期主要在神话和歌谣研究领域进行人类学方法的尝试，新时期以来，在现代人类学及后现代相关理论的影响下，研究领域逐渐扩大到文学文本和文化文本。两个历史时期的研究实践表明，文学人类学在方法论上的追求是一脉相承的，具体表现为跨文化比较、原始主义、语境主义以及田野调查等方法的提出和应用。人类学从研究不同文化的“普遍性经验”到“地方性经验”进而充分考察“个体性经验”，文学人类学据此可以进行新的方法论尝试。

摘自：《文艺理论研究》2014 年 2 期

艺术史与艺术理论的紧张

周宪

艺术史与艺术理论历来存在着既爱又恨的复杂关系。从艺术史创始之初到今天，这样复杂的关系一直延续着。本文从历史描述的角度，对艺术史研究的两次理论“入侵”展开分析，一次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艺术理论对艺术史的塑形，另一次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种种激进理论对艺术史的重构。因此艺术史与理论的紧张，一方面体

现为作为经验科学的艺术史与作为阐释学科的艺术史的冲突，另一方面又呈现在艺术理论的审美理性主义范式与理论的政治实用主义范式之间的抵牾。艺术史离不开理论，但它又不可避免地抵触理论。本文提出这样的问题：艺术史研究是以艺术为主旨还是以历史为主旨？艺术史的审美理性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如何协调？

摘自：《文艺研究》2014 年 5 期